

亚洲的未来

〔美〕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 著

俞源 顾德欣 曹光荣 译



亚洲的未来

〔美〕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 著
俞 源 顾德欣 曹光荣 译

国际文化出版社

亚 洲 的 未 来

〔美〕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 著
俞 源 顾德欣 曹光荣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6.625 印张 143千字

1990年1月第一版 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94—501—~~6~~4 D·40

定价：3.00元 （内部发行）

August 24, 1989
Beijing

Editor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ess
Beijing

Dear Sirs:

This letter is to signify that you have permission to publish a collection of my articles and essays under the title, Asia's Future; enclosed is also a photo of myself for your use.

Sincerely Yours,
Robert A. Scalapino

1989.8.24 北京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

亲爱的先生们:

这封信表明,你们有权出版我以《亚洲的未来》为题的论文集。附上我的照片供你们出书时使用。

您忠诚的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

译者前言

亚洲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29%，其居民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7%，是地球上最大的洲。亚洲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这里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巴比伦的所在地。中世纪的汉唐帝国是同时代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直到中世纪后期，明代的中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印度莫卧儿帝国仍然是世界“权力中心”。而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还未见端倪。

但是，进入近代之后，亚洲落伍了，大多数国家先后沦为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殖民地，名义上独立的中华帝国，实际上也是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

亚洲的许多古代大帝国，为什么近代落伍了？这些大帝国有什么强点和弱点？亚洲如何才能重新崛起？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曾经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指出中国、印度和波斯的反殖民主义起义会反转过来推进欧洲的革命，给人类带来新的曙光。20世纪初期，列宁从同一意义上提出“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的论断，因为当时亚洲的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正在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然而，直至20世纪中期，世界政治的“权力中心”仍然在欧美。

亚洲未来的前途如何？这是当今亚洲人民极为关心，也是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瞩目的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多年来发表了大量关于亚洲问题的论著。去年，

承蒙斯卡拉反诺教授热情地将《亚洲的未来》、《东北亚的大国关系》、《太平洋地区的地区主义》和《日本的对外政策》等论著介绍给我们，其中《太平洋地区的地区主义》和《日本的对外政策》是尚未发表过的新著。我们把这些论著翻译出来，编辑成书，以飨读者。正如作者在中译本序中所说，上述论文只是美国一位学者的观点。作者是美国亚洲问题学者，又是美国政府在亚洲问题方面的重要顾问之一，基本立场观点自然会与我们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翻译出版这些论著，供我国外事与研究工作者参考，也许将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一位具有权威的者是如何看待亚洲的现实与未来的。

斯卡拉皮诺教授在收入本书的论文中，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政治开放的冲突，亚洲各国的相互关系以及同其他地区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大国关系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亚洲各国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他对亚洲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笼罩在大国关系上空的战争风云已在亚洲大为削弱，亚洲将摆脱可怕的战争威胁进入21世纪，使得人们可以更多地注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我们认为，对亚洲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是适宜的。亚洲的未来是亚洲历史的延续；亚洲是世界中的亚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考察分析亚洲未来时，必须看到亚洲的历史对于未来，全球经济政治形势对于亚洲发展产生的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

当前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近一两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趋向

缓和，出现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新局面。亚洲面临着同样的形势。

亚洲的持久和平是有希望的。近一年来，美苏在亚洲的对峙有所缓解，“热点”普遍降温。亚洲局势的缓和是世界历史和亚洲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亚洲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是，全世界和亚洲形势趋于缓和，并不像田园诗那样美好诱人。有人认为，这种缓和是“冷战和平的结束，竞争和平的到来”，不无道理。人们看到，大国和世界各国都在抓住机会，调整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以适应未来综合国力的较量。这种竞争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无情较量。对于大多数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来说，科技、教育比较落后，这种竞争——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斗争，同样关系着亚洲各国的兴亡。它们未来的命运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还应当看到，亚洲形势趋于缓和，仍然存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不能认为缓和是不可逆转的。亚洲能否维护持久的和平？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是广阔的，但这首先需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亚洲国家切实做到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同时，亚洲国家要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做到相互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是这样，亚洲不但可以摆脱战争的威胁，进入21世纪，并且有可能在各国的和平发展与经济合作中走向繁荣。

现在，亚洲的经济发展势头，令世界瞩目。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亚洲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摩擦加剧，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某些技术垄断政

者指正。

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和前辈陈翰笙教授很关心本书的翻译出版，并欣然命笔题写了本书中译本书名。

译 者

1989年元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中译本序.....	(1)
亚洲的未来.....	(3)
东北亚的大国关系.....	(40)
一、导言.....	(40)
二、大国的经济关系.....	(43)
三、政治与大国.....	(64)
四、以东北亚为中心的战略结构.....	(105)
五、对美国亚洲政策的看法.....	(118)
太平洋地区的地区主义	
——太平洋盆地的前景与问题.....	(122)
日本的对外政策.....	(143)
日本对外政策的背景.....	(143)
战前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	(162)
1945年以来的日本占领及其后果.....	(167)
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	(177)
当前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几个问题.....	(186)
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安全问题.....	(192)
与大国的关系及对大国地位的追求.....	(195)

中 译 本 序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激动而充满希望的时代。未来数十年即将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将超过过去的几百年。各国政府能跟上目前社会经济革命的飞快步伐吗？我们能改善地区一级和国际一级的治理吗？在地区一级，公民们每天面临着生计问题，而在国际一级，各国面临着战争与和平以及相互间的经济交往这些严峻的问题。

挑战是巨大的，但人类历史从来也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把科学技术与基础知识结合在一起，以此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避免全球战争的前景似乎不错，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国都面临着影响深远的国内问题，所以需要集中精力于国内的任务。同时，诸如在电子、生物工程和空间等领域，我们即将取得重大的新进展，而这需要比现在更多的国际合作和更强有力的国际组织。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很乐于把关于亚洲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些想法用中文发表出来，以飨中国读者。与美国一样，中国肯定要在21世纪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两国能够继续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将使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拥有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世界。发表在这里的这些文章旨在引起人们对当代亚洲舞台上最重要问题的关注。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文章仅表明一个美国学者的观点。而在美国和其他

国家还有其他不同的观点。不过，如果这些文章能促进人们的思考和深入讨论，也就算达到了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

1988年4月13日

亚 洲 的 未 来^{*}

在亚洲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亚洲各国的领导人考虑着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涉及文化和政治方针。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今后若干年采取何种合适的经济战略。经济问题实际上影响到亚太这一片辽阔地域上的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先进工业国家，新兴工业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在需要政治稳定和日益要求进一步开放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要求开放的压力来自新兴的精英阶层，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及更多的决策过程参与权。

第三个主要问题是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外部大国，尤其是美苏两国的关系。地区主义正在抬头，当今各国越来越多地要求摆脱两个超级大国。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正在减少，而和平发展的希望越来越大。

总之，有理由对亚洲持乐观态度。

^{*}本文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1987年秋季号。

二

仅仅在数年前，大多数亚洲领导人才对奉行的经济政策表现得充满信心。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奉行斯大林的“大推进”战略。他们自豪地宣布获得了成功，并公布大量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数量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它们的宣传不无道理。斯大林的方针是一门心思把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在工业化上，采用集中指挥战术和严格的政治控制，因而在苏联及其最忠实的亚洲追随者中都初战告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一种“赶上”执行较为审慎发展方针的国家的可行方法，尽管这种方法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失衡。但到了一定的时候，收益下降的情况就开始了。这种战略固有的僵化性，即微小的演变潜力表现为主动性较差，生产效率低下，资源和人力过度浪费以及产品质量低劣。这些都是自给自足制度的印记。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执行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准则的国家竟然使自己置身于经济领域日趋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国际潮流之外。落后于时代成了一个真正的威胁。

苏联和东欧首先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在苏联，赫鲁晓夫进行了初步尝试以解决经济问题。在这前后，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相继进行了试验，而捷克斯洛伐克的试验归于流产。早在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发现有必要修正斯大林主义来适应中国社会的情况。确实，这是引起中苏反目的一个因素。由于中国巨大的农业社会冲击着已

已经人满为患的中心城市，它不能让农业阶层作出牺牲，而这是苏联实现工业化努力的显著特征。构想不甚完善的公社制度是中国早些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然而，今天中国正进行着一场方向不同的、影响深远的改革。中国以自信的态度为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榜样。邓小平保证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公社制度迅速解体，代之以家庭与政府签定的承包合同，这种从集体化的大倒退带来了农业产量的巨大增长以及中小型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付出了代价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共同承受贫穷比共同分享富裕更容易。而且，一旦可以自由选择，农民中就会出现这种趋势：种植那些收益最大的——商品作物，而不是粮食。为了弥补这种趋势带来的损失，国家的农业补贴一直保持在极高的水平上。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又与某些优先项目争夺资源。不清楚地方一级保证维护必要的基础设施（灌溉渠道、道路和卫生设施）的诺言是否起一点作用。也不清楚各地方对计划生育的保证是否兑现，因为田地里需要更多的人手。然而这些问题即使不能彻底解决，也可以减少或控制。总的说来，农村改革证明取得了确实无疑的成功并且得到了公民的承认。当中国领导人宣布决不走回头路时，首先是农村的变革为这一诺言提供了保证。

当然，更棘手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的城市部分。物价改革以及与之必然相伴随的工业合理化是核心难题。只要物价与生产成本联系有限，提高工业效率的运动就可能失败，补贴和国营企业的补贴或赤字就将大量吃掉政府预算。然而，如

果在当前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进行彻底的物价改革，又担心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的改革者们还面临其他难题。权力集中和权力分散之间怎样保持最佳平衡？每个工厂内，管理人员与党的干部之间又怎样保持最佳平衡？如果要充分重视各地的不同情况和鼓励工厂的主动性，权力分散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集中计划和资源配给根深蒂固的体制下，权力分散又谈何容易。此外，简单生硬的权力分散又引起了外汇挥霍无度和腐败行为骤增等严重恶果。重工业基本上还在北京的控制之下，它是工业部门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省和地区一级政治领导人的能力和意志又参差不齐。有的领导人被公认为是个“实干家”，而有的领导人则被认为是个“死气沉沉的事务主义者”。同时，党的干部和工厂管理人员以不同的方法使自己适应把工厂经营权交给管理人员的政令。实权掌握在谁手里各地大不一样。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现在可以解雇效率低或偷懒的工人，但这种方法很少有人采用。整个社会的工资仍处于扭曲状态，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在改革中的经济受益至今仍然是最少的。

所以，关于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的辩论已经展开是不足为奇的。在有些地区，甚至有人怀疑改革的方向。对统制经济修修补补其作用是有限的；而进行根本性变革，又得冒前途未卜的风险，在考虑到政治后果时尤其如此。中国现领导的观点也有不同。每一个行动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并因此而引起新的讨论和辩论。有人认为，中国领导层内分成界限分明的两派，即“进步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毫无疑问，有些人经常表现出谨慎，甚至是挑剔的倾

向，而另外一些人则显示出不耐烦和敢作敢为的气质。私人关系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总是活跃的因素，不论作何分析，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然而起决定作用的事实是，目前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掌握在那些仍然坚信过去的自给自足政策不能把中国成功带入21世纪的人手中。他们决心继续保持和发展与先进工业国的关系，使它们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因此，他们是真正的改革者，但不是自由主义者。

有人认为，尽管宣称搞什么规划，中国的改革具有运动的性质。说教和动员之后往往是行动过火，接着就是紧缩开支。有句口号叫“进两步退一步”，这是对中国式发展的一种写照。最能解释中国现象的可能是黑格尔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中国走自己的路，有可能度过难关取得成功，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坚定不移、正视挫折，以试验和过失为先导，还免不了遇到周期性的倒退，但他们认识到，现成的政策不可能使12.5亿人民迅速实现现代化。简单地说，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难题是：列宁式的社会主义与市场导向的经济能令人满意地结合在一起吗？“市场社会主义”会不会运转？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它能不能有效地运转？

三

（在北朝鲜，由内向转为外向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试验性的、暂时的。在1972—1973年，北朝鲜首次尝试这一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一努力恰巧遇上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果带来了严重的债务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断地向日本和西方发出经济的政治的信号，尽管这些信号往

往自相矛盾，反映出领导集团内的意见分歧。不断下降的经济增长率和过时的工业呈现的恶兆明确地显示出改变的必要。虽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为南朝鲜的 $1/2$ ，但据估计：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南朝鲜的 $1/4$ ，甚至有可能更少。缺少适合于出口的产品，再加上军品进口占用了紧缺的外汇，使得北朝鲜不可能支付它的外债，它在国际上的信用度等级低得可怜。高额军费开支（据日本和西方人士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5-20\%$ ），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由于北朝鲜的经济困难影响到它的安全（使它越来越落后于南朝鲜），因此，平壤领导人对中国的试验表现出一定兴趣，迅速转向苏联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到处寻求技术，甚至于为此颁布了合资企业法等，人们也不感到奇怪了。

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北朝鲜准备作大胆的改革。一段时间以来，北朝鲜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的贸易有了增长，虽然日本公司近几年来普遍要求支付现金。北朝鲜与日本的贸易约占它对外贸易总额的 11% 。日本的投资几乎都来自亲北朝鲜的居民。北朝鲜对现代技术的要求基本上仍面向苏联和东欧。除了转变方向所涉及的经济困难外，北朝鲜还面临着另一个困境：更广泛的对外开放将带来怎样的政治后果？一旦真正面对外部世界，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接受了更多思想灌输而与世隔绝的北朝鲜人，还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洁”和统一吗？

不管怎样，改革的初步迹象已清晰可辨。伟大领袖的儿子、已定的继承人金正日，似乎已经掌握了日常统治权，并且聚集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技术的人才。他父亲一代的游击战士正在迅速消失。或早或迟作为朝鲜历史名称